

# 英汉疾病隐喻的关联认知阐释

——兼谈对英语教学的启示

钱永红, 王维

(南京审计学院 金审学院, 江苏 南京 211815)

**摘要:**疾病隐喻是人们将熟知的、常见的一些其他领域的概念映射到疾病领域而产生的, 它也是一种以话语为框架、以词为焦点的话语现象。疾病隐喻的使用与理解实际上都是受关联原则支配的, 可以运用语用学的关联认知理论对疾病隐喻的产生与理解机制进行阐释, 这对英语教学方面也具有一定的启示。

**关键词:**疾病隐喻; 认知; 关联理论; 英语教学

**中图分类号:**H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750(2011)03-0091-06 **收稿日期:**2011-01-25

**作者简介:**钱永红(1980—), 女, 江苏如皋人, 南京审计学院金审学院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英汉对比与翻译、语用学; 王维(1983—), 女, 江苏南京人, 南京审计学院金审学院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语言教学。

**基金项目:**南京审计学院校级青年项目(NSK2009/C20)

## 一、引言

隐喻是一种普遍现象, 人们每时每刻都在使用大量的隐喻, 英国修辞学家 Richard 曾经说过, “我们日常会话中几乎每三句话中就可能出现一个隐喻”<sup>[1]</sup>。近年来, 隐喻从传统修辞学的研究对象逐渐扩展为众多学科如语言学、哲学、语用学、语义学、心理学、文学批评、认知科学、心理分析、语言心理学、翻译学、符号学以及外语教学等的研究对象, 全世界范围内似乎已经掀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隐喻革命”(Metaphoric Revolution), 隐喻研究被推到了空前的地位, 席卷着众多学科领域。“隐喻至上”亦已成为当今语言研究的一大特点<sup>[2]</sup>。

随着研究的深入, 人们越来越深切地意识到隐喻在人类认知和社会活动中不可低估的作用, 国内外许多学者从各个角度对这种语言现象展开了广泛探讨, 其中包括对疾病隐喻的研究。Sonntag 围绕肺结核、癌症、梅毒、艾滋病这些不同时代的流行病揭示了许多军事隐喻, 如病毒的侵入、杀

死 T-cell 细胞、潜伏、转移等, 认为这反映了大量的文化现象和社会心理现象<sup>[3]</sup>。目前国内关于疾病隐喻的研究还不充分, 发表的科研成果为数不多且级别普遍偏低。田喜娥与贺本才<sup>[4]</sup>、朱秀锋<sup>[5]</sup>、谭光辉<sup>[6]</sup>、查日新和汤黎<sup>[7]</sup>等人主要从文学创作的角度研究了疾病隐喻与文学创作之间的联系; 孙雯波, 胡凯<sup>[8]</sup>从道德方面阐释了疾病隐喻; 李蓉从性别的视角研究了疾病隐喻, 通过分析女性疾病的自我书写中所呈现出来的个人的、性别的意味, 揭示了其中所包含的性别立场和意义<sup>[9]</sup>; 廉洁从防治非典的隐喻研究了汉民族的文化心理特征<sup>[10]</sup>; 张薇从认知语言学角度分析了英汉疾病语篇的异同及原因<sup>[11]</sup>。纵观以上研究, 我们可以发现, 学者们从文学的角度进行的研究相对较多, 而从语言学角度进行的研究则相对偏少, 从语用学角度对疾病隐喻的研究至今为止还尚未涉及。

鉴于疾病隐喻在日常生活中的丰富运用以及隐喻的使用与理解离不开语境和使用者的文化、心理等因素, 本文将尝试从语用学角度对疾病隐

喻的产生与理解作认知关联性阐释,旨在探索疾病语言的产生机制与理解机制及其使用的内在规律,从而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和使用这方面的隐喻语言。

## 二、英汉语言中的疾病隐喻现象

疾病隐喻的使用是人类将其他领域的经验用来说明或理解疾病领域经验的一种认知活动。由于世界各国的文化有相通之处,人类思维和认知方式也具有相似性,因此我们对于疾病隐喻的一些经验和认识也是世界共通的<sup>[12]</sup>。中英文常用的疾病隐喻具有较强的相似性,人们会选择同样的事物来描绘疾病。

人们通常会将某些疾病与一些非自然力量联系在一起,比如将疾病比喻成妖魔、鬼怪等。

(1) 病魔夺走两个姐姐生命……红斑狼疮虽然不能肯定是不治之症,但医学界至今也没有研究出根除此病的方法,二十多年前,李玉君的二姐最先被查出患上了红斑狼疮没过几年,她的三姐也被诊断出同样的病,并且同样没能逃过“病魔”。

英文中的类似表达也有一些例子,比如例(2)中将癌症等疾病比作吃人的怪兽一点点将人吞噬,赋予疾病贪婪、嗜血的特征。

(2) The cancer in my body is torturing me ... I know it's eating away at me every day and night...

人们还经常会将疾病比作敌人。这种情况在英汉两种语言中都比较多见,并且基本都是用在描述一些涉及范围大、传染性强的流行性疾病方面。这主要是因为此类疾病在全世界范围内影响都比较大,涉及的范围广,引起全世界人民的普遍关注,而且要防治疾病,防止病例的扩展,必须依靠全民的行动和力量,高度警惕,像与敌人打仗一样“抗击”疾病,与疾病“作斗争”,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3) 虽然中国的卫生体系存在缺陷,但是中国现在还是非常有效地控制住了“非典”疫情。请问李副部长,从中国对 SARS 应战的这场战役当中,中国学到了哪些经验能够与世界上其他特别是穷困的发展中国家来分享,怎么样采取有效措施来应对像非典这样的传染病?

(4) We don't need to wait to act... In the fight against flu, preparation is more than half the battle — and we need everyone to chip in.

当然,在某些情况下,人们会将一些自然界的现象或自然生物的某些特性映射到疾病领域,病情会像高智商的动物或人类一样具备一定的能力,会隐藏、埋伏、伺机而动;又能像火山一样“爆发”,其来势迅猛,后果也不可预料;还会如蔓草滋生,连绵不断地扩展范围;抑或病情的发展可以如波浪一样后浪推前浪接踵而来,等等。如例(5)、例(6)所示:

(5) 甲型 H1N1 流感自去年 4 月开始在美洲爆发,目前宣布流感大流行已经结束还为时过早,此外,目前尚无法断定今后几个月北半球的疫情形势如何发展,是否会有新一波的严重疫情爆发。

(6) At the same time, health officials are investigating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disease has affected a fifth hospital in the metropolitan Toronto area since a new wave of illness was reported last Thursday, suggesting that the potential for greater spread continued. In the new wave in Toronto, there are at least 11 probable and 23 suspected SARS cases, and the numbers are expected to rise over the next few days, health officials said. But a broad outbreak remains a possibility, even if remote.

从上面两例可以看出,像“爆发”、“蔓延”及“波浪”方面的汉语疾病隐喻在英文中也有“outbreak”、“spread”及“wave”等隐喻概念与之相对应。这主要是源于英汉民族对自然的体验有相通之处,而且媒体的信息共享也加强了此类隐喻的渗透趋势。

疾病隐喻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现象,而且它也是一种人类的认知现象和一种思维方式,是人类用其他领域的经验与体验来说明或理解疾病领域的经验的一种认知活动。当然,随着疾病隐喻的发展,人们也开始用疾病领域的经验来认知其他领域的概念。比如以下三个例子都使用了以疾病为始源域的隐喻。

(7) 你要想做通他们的思想工作,首先必须找出他们问题的病根在哪里。

(8) 这显然就是个病句嘛。

(9) 这个人疑心病太重了,没法与他相处。

鉴于疾病隐喻的使用如此频繁多见且丰富多样,我们对其使用及理解的研究也就显得非常有必要了。那么,疾病隐喻是怎么产生的?听话人或读者又是怎样顺利识别和理解其含义的呢?理

查兹指出,传统隐喻理论最大的缺陷就是忽视了隐喻从根本上讲是一种思想之间的交流(inter-course)和语境之间的相互作用(transaction)。疾病隐喻也是一种以句子(话语)为框架,以词为焦点的话语现象。隐喻作为一种语用现象,它的识别需要语境提供线索,在字面意义无法成立时,通过对话题和词语指称对象变换的判断来准确理解话语意义<sup>[13]</sup>。由于隐喻的产生、识别和理解与语境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它又是人类认知的一种现象和工具,那么我们完全可以尝试采用语用学的认知关联理论对其作出阐释。

### 三、英汉疾病隐喻的关联认知阐释

#### (一) 关联理论的隐喻观

Sperber 和 Wilson 在专著《关联性:交际与认知》一书中提出了以关联为原则、明示-推理为理解模式的关联理论,并用关联理论阐释了隐喻现象<sup>[14]</sup>。关联理论认为,推理的过程就是寻找话语与语境关联的过程。人们通过不同程度的努力,根据话语提供的词语信息、逻辑信息及人们本身所具有的百科信息,在推理过程中选择最合适的语境,并寻求话语与语境之间的最佳关联,从而正确理解话语<sup>[15]</sup>。关联原则的两条基本原则是认知原则(人类认知倾向于同最大关联相吻合)和交际原则(每一个明示的交际行为都应设想为它本身具有最佳关联)。隐喻的使用是说话人(或作者)为了不直接解释其交际意图或为了使自己的交际手段更为生动传神而采用的手段,是为寻求最佳关联而采取的一种方式 and 策略,隐喻的使用与理解实际上都是受关联原则支配的。实质上,人类交际的过程就是明示-推理的过程:交际一方提供说明本人意图的相关信息,另一方则根据该信息和相关的语境及背景知识推导出对方意欲传达的意图。隐喻的一个重要语义特点是喻体所表征的意义或特征与本体所表征的意义或特征会相互冲突,因而对隐喻的理解需要依据本体和喻体之间的相似性或关联性对这种冲突加以排除进而推理完成。因此,隐喻的认知过程就是将本来属于某一领域的事物特征转移到另一领域,所引起的相关意象从“不和谐”到“和谐”的动态互动作用过程。

Sperber 和 Wilson 认为,语境是理解话语意义的假设集(a set of assumptions)<sup>[14]</sup>。语言交际中,

听话人对世界的假设以概念表征(conceptual representation)的形式存储在大脑里构成其认知环境,认知环境中的各种信息构成信息接收者理解话语的潜在认知语境。在听话人理解话语的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不仅是具体的情景因素,而且还包括认知环境中的旧信息。理解话语的过程就是认知环境中的旧信息和交际过程中的新信息相互作用的过程。关联理论认为,语言交际的基础是交际双方共有的认知环境,认知语境是“语用者系统化了的语用知识”<sup>[16]</sup>,它以动态的方式来考察隐喻的工作机制,隐喻意义是听者通过关联推理、构建隐含前提来实现的,而隐含前提的构建取决于听者个人的认知环境,认知环境的不同会直接影响隐喻意义的理解。Lakoff 和 Johnson 被视为近年来从认知角度研究隐喻的代表人物,他们于 1980 年出版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被视为这一领域研究隐喻的经典著作。他们在这本书的开篇中就指出了隐喻的认知作用:隐喻在日常生活中无所不在,不仅在语言中,而且在我们的思维和行动中都是这样<sup>[17]</sup>。他们在专著中将隐喻的理解上升到“认知方式”和“推理机制”这个高度,这种认知方式与推理机制正好与 Sperber 和 Wilson 的关联理论有相交之处。下面我们将从信息发出者的隐喻使用与信息接收者理解两方面对疾病隐喻进行关联认知阐释。

#### (二) 疾病隐喻的关联认知阐释

Sperber 和 Wilson 指出,交际者在交际中以最佳关联为目的,让信息接收者在信息处理时付出尽可能少的努力,获取足够的语境效果<sup>[14]</sup>。因此,交际者会尽量让自己的语言输出去顺应听话人处理信息的这一需求,以减少信息接收者理解话语时所付出的认知代价或心理努力。人脑对杂乱的客观世界进行感知和加工时,总是习惯于根据新认识事物的特征,在记忆中搜寻与新事物有联系的事物,使它们发生关系,然后形成一个新的概念范畴,从而生成新的隐喻。疾病隐喻的使用是说话人(或作者)为了不直接解释自己对疾病的体会和认识而产生的一种表达方式,是为了寻求最佳关联性而采取的一种语言手段。在对各种疾病的认知过程中,人们会试图用生动形象的语言去描述疾病的各种特征,大脑便会在已有的知识架构中寻找与疾病特征具有某种程度上相同或相似的已有概念,运用一定的语言结构使其他领

域概念与疾病概念发生关系,将其他领域事物的特征映射到疾病领域并形成一个新的概念范畴,从而产生疾病隐喻,以更生动地表达人们对疾病的认识和体会,如上文例(1)中的病名“红斑狼疮”。我们知道,“红斑狼疮”是一种威胁人类健康的恶性皮肤病,人们在深受其害的过程中逐渐了解到此病的种种特征,比如起病或隐匿或急骤,发作比较凶险且极易复发,迁延不愈,出没无常,就跟狼一样狡猾,另外病人的皮肤损害会出现盘状红斑,多形红斑,大疱性红斑等等,像被狼咬过后留下的疤痕,因此而得名“红斑狼疮”,可谓既形象逼真,又内涵丰富。人们在认知类似难以根治的疾病时,会逐渐了解到此类疾病的损害性、顽固性以及凶险性,然后便与传统文化中具有相似特征的妖魔鬼怪的概念联系起来,并将其特征映射到疾病领域,达到矛盾与相似性的统一,从而形成了相应的疾病隐喻表达方式。

从信息接受方来看,根据关联原则,信息发出者所作的任何明示性的交际行为都意味着该行为具有最佳关联性。在推断疾病隐喻意义的过程中,信息接收者首先借助自己的认知语境(逻辑信息、百科信息、词汇信息等)进行联想,寻找喻体的可能值。读者在理解这个疾病隐喻时,会根据作者提供的上下文语境、自己已有的对这种不治之症的百科知识,以及对传统文化中妖魔鬼怪特征的了解,让各种信息相互发生关联,提取出“魔”的相关特征,从而更生动地体会到作者将“红斑狼疮”这种疾病比作无恶不作的魔鬼的交际意图。

根据关联理论的隐喻观我们可以知道,对疾病隐喻的理解过程与一般话语的理解过程一样,都受到关联的支配。关联理论指出,信息发出者的话语激活了信息接收者对关联的期待,在这种对关联的期待的引导下,交际者将编码概念、语境信息及关联视为输入内容,通过显性内容、语境和隐含意义的相互作用与调整推导出表征含义的临时概念。值得注意的是,在喻体特征向本体映射过程中,本体所具有的特征也会对映射到目标域的特征有一定的选择和限制作用。本体与喻体之间存在矛盾的对立统一关系,两者之间具有互动性。隐喻意义的产生一般来说主要是喻体向本体的映射,但不可否认的是,本体的特征也会决定喻体的哪些特征会被映射,其对映射结果有着不可

忽视的作用。而在隐喻的理解过程中,人们会根据不同的本体有选择地将它的某一种或若干种特征提取选择出来,映射到不同的事体上去。也就是说,不同的本体在映射过程中对喻体的特征有限制和选择的作用,进而才会生成恰当的映合结果。比如以下几个例子:

(10) 红斑狼疮这个可恶的病魔把她折磨得奄奄一息。

(11) 这个男人是个大色魔,女孩子们要记得离他远一点。

(12) 诗魔——白居易……白居易写诗非常刻苦,过分的诵读和书写,竟到了口舌生疮、手指成胝的地步。所以人称“诗魔”。

“魔”这个概念在人类文化和意识中本身具有多种特征,比如危害人类、给人带来痛苦、能力无边、贪婪成性、疯疯癫癫、变化莫测、不可捉摸等等。这三个不同的例子中,读者或听话人却能正确地分别提取“魔”这个喻体与各自本体相关联的特征,听话人通过语境的选择和补充来推断本体和喻体之间的相似性,确定话语和语境之间的最佳关联,获得最好的语境效果。比如例(10)中,根据“红斑狼疮”“折磨”“奄奄一息”等语境信息,读者可以成功推知这些信息与“病魔”都是相互关联的,读者会自动调用语境信息和相关百科信息推断“病魔”暗喻此疾病所具有的健康并给人带来痛苦和烦恼的特征,获得最佳的语境效果;例(11)中,读者看到男人、色、女孩子这些语境信息,便会假设他们之间具备最佳的关联性,于是便把说话人(或作者)所提供的信息进行整合,从而理解“色魔”形容对女色存有贪婪之念并霸占侮辱的人。同样我们可以推知例(12)中“诗魔”是用来形容有才华横溢的诗人,是对作诗达到如痴如狂的地步并好像具有超能力的、创作出了无比优秀作品的人。

我们再来看一个英文疾病隐喻的例子:

(13) At the same time, health officials are investigating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disease has affected a fifth hospital in the metropolitan Toronto area since a new wave of illness was reported last Thursday, suggesting that the potential for greater spread continued. In the new wave in Toronto, there are at least 11 probable and 23 suspected SARS cases, and the numbers are expected to rise over the next few

days, health officials said. But a broad outbreak remains a possibility, even if remote.

根据关联理论的隐喻观,任何明示性的交际行为都意味着该行为具有最佳关联性。读者在推断画线部分疾病隐喻意义的过程中,首先借助自己的认知语境(逻辑信息、百科信息、词汇信息等)进行联想,寻找喻体的可能值。根据作者提供的上下文语境,读者将话语中提及的 SARS 病情、“a new wave”及“outbreak”进行关联处理,假设这些信息具备最佳的关联性,并选择本体与喻体之间的映射特征,从而准确地理解 SARS 病情一浪接一浪反复出现并危害人类健康的状况“像火山爆发一样”来势迅猛。对于英文中这样的疾病隐喻例子,我们可以借助于关联理论及类似的文化、语言习惯的相互渗透来理解。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用关联理论对疾病隐喻的产生与理解机制进行分析能够给人们点对类似疾病隐喻现象的理解提供一定帮助。

#### 四、疾病隐喻的关联认知阐释 对教学的启示

疾病隐喻在人类各种交际语篇中比较常见,尤其是在全世界经历了禽流感、非典、甲流等几次大规模的流行病之后,疾病隐喻更是掀起了一股热潮。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疾病隐喻的关联认知对比研究对英语教学也具有一定的启示。

教师在英语教学中应该有意识地帮助学生树立英汉语言疾病隐喻的意识,帮助他们发现和掌握英汉之间在疾病隐喻概念上的异同之处,形成对比反思的思维,从而提高学生理解和应用英语疾病隐喻语言的能力。比如,教师要让学生了解疾病隐喻的使用是人类将其他领域的经验用来说明或理解疾病领域经验的一种认知活动,由于世界各国的文化、地理环境、人类思维和认知方式具有相当多的相似性,中英文常用的疾病隐喻也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人们会选择同样的事物来描绘疾病。然而,每个民族又都有自己特定的思维模式,而作为认知思维方式的隐喻在语言中无处不在,其中两种语言所体现出的疾病隐喻现象必然有所差别。如果教师能帮助学生把握好中西两种文化中疾病隐喻的差异性,学生在阅读时就能更加深刻地理解疾病语言现象,取得良好的学习效果。

疾病隐喻是一种在广阔的语境中出现的话语

现象,信息发出者在隐喻中的意义是间接表达的,所以作者或说话人真正的交际意图需要借助语境进行语用推理才能获得<sup>[18]</sup>。根据关联理论的交际原则,每一个明示的交际行为都应设想为它本身具有最佳关联。因此,教师在英语教学中可以按照 Sperber 与 Wilson 提出的演绎推理模式有意识地引导学生采取最佳关联方法,使学生能善于利用语言语境与交际语境中所包含的各种信息。学生根据话语提供的词语信息、逻辑信息及自身所具有的百科信息,在推理过程中选择最合适的语境,并寻求话语与语境之间的最佳关联,从而正确理解疾病隐喻语言。

(14) Avian influenza: perfect storm now gathering?

这个例子将“Avian influenza”(禽流感)与“storm”(暴风雨)相提并论,用意何在呢?教师在教学中应引导学生利用上下文信息进行分析和推导,从而达到理想的理解效果。根据关联理论,信息发出者每一个明示的交际行为都应设想为它本身具有最佳关联,也就是说,例(14)中所给的信息都是相关联的,包含着作者的交际意图并且传达一定的信息,因此教师要引导学生在脑海中浮现有关“Avian influenza”与“storm”的特征,并让他们将这些特征有选择性联系在一起。通过一系列的推断之后,学生便可以顺利地理解这个句子的含义,即它是将“storm”来势凶猛的特点映射到目标域“Avian influenza”当中,从而生动描绘了禽流感疫情爆发的迅猛势头,成功地引起人们对此疫情的高度警觉。

此外,在英语教学中,教师不应该仅仅把注意力放在所谓的语言点上,还应该启发和引导学生主动去联想和探索西方民族的疾病隐喻思维和世界观<sup>[19]</sup>,因为这些都是顺利理解隐喻语言的重要线索,有助于帮助学生在推理过程中正确地寻找到最佳关联,从而顺利地理解疾病隐喻语言。

总而言之,疾病隐喻不仅仅是一种修辞手法,更是一种思维方式。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仅要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有意识地启发和引导学生的疾病隐喻语用能力,注重培养学生的疾病隐喻认知能力,这不仅有利于疾病领域的英语学习,还能够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学习能力。

#### 五、结语

隐喻的理解就是听话人通过认知语境将接受

话语建立的新假设进行关联、激活、选择、推理,最终获得隐喻会话含意的过程。关联理论把关联看作常项,把语境看作变项,交际总是具有最大的关联取向。疾病隐喻的理解是人们从认知语境中选择最佳相关的假设,以最小的努力对话语所建立的新假设加以处理来获得最大的语境效果,从而找到话语的最佳关联的解释。此外,对疾病隐喻的关联认知语用的研究对于英语的教学也可以提供一定的启示。

#### 参考文献:

- [1] Ritchard I A. The philosophy of rhetoric[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6:96.
- [2] 王寅. 认知语言学[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9:402.
- [3] 桑塔格 S. 疾病的隐喻[M]. 程魏,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 [4] 田喜娥,贺本才. 疾病隐喻与文学[J].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6(7): 25-27.
- [5] 朱秀锋.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结核隐喻探析[J]. 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07(1): 42-44.
- [6] 谭光辉. 民初哀情小说与黑幕小说新论疾病隐喻[J]. 当代文坛,2006(4): 58-60.
- [7] 查日新,汤黎. 浅析桑塔格对疾病隐喻的文化解读[J]. 理论视野,2008(2): 79-83.
- [8] 孙雯波,胡凯. 疾病的隐喻与疾病道德化[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0(6):43-46.
- [9] 李蓉. 性别视角下的疾病隐喻[J]. 南开学报,2007(6): 9-15.
- [10] 廉洁. 从防治非典的战争隐喻看汉民族的文化心理特征[J]. 甘肃社会科学,2004(5): 75-77.
- [11] 张薇. 疾病语篇的隐喻认知分析[J]. 江苏教育学院学报,2009(6): 109-111.
- [12] 唐燕萍. 浅谈外语教学中隐喻思维能力的培养[J]. 南京审计学院学报,2006(4):40-42.
- [13] 束定芳. 隐喻学研究[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 [14] Sperber D, Wilson D.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M]. Oxford:Blackwell, 1986: 178.
- [15] 何自然. 语用学与英语学习[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5:19.
- [16] 熊学亮. 认知语用学概论[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165.
- [17] Lakoff G, Johnson M. Metaphors we live by[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
- [18] 于广,王松鹤. 一堂语篇阅读教学课程的个案分析[J]. 外语学刊,2011(2):52-55.
- [19] 肖武云. 隐喻的认知语用解读[J]. 衡阳师范学院学报, 2008(4): 129-132.

(责任编辑:黄 燕)

## A Cognitive Study of Illness Metaphor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Based on Relevance Theory

QIAN Yong-hong, WANG Wei

**Abstract:** Metaphor is pervasive in everyday life, not just in language but in thought and action. Illness metaphors, as a pragmatic phenomenon, are used to describe and understand illness through concepts of other domains. Comprehension of illness metaphors requires adequate consideration of context clues. The present paper aims to study the production and comprehension mechanism of illness metaphors through a cognitive approach based on Sperber and Levinson's Relevance Theory, and then explores its application in language teaching.

**Key words:** illness metaphor; cognition; Relevance Theory; English teaching

# 大学课程改革的阻力及其化解探讨

——基于利益相关者的视角

刘付林

(南京审计学院 校长办公室, 江苏 南京 211815)

**摘要:** 为了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 加强课程改革成为大学的共同选择。然而, 源自各方的重重阻力使得大学课程改革效果不甚理想。要提高大学课程改革的实效, 需要深入分析政府、教师、学生、用人单位等四类重要利益相关者产生的阻力, 并从整体利益出发, 在加大政府经费投入、促进教师主动参与、凸显学生主体地位、加强与用人单位沟通等方面作出努力, 化解各方之于大学课程改革的阻力。

**关键词:** 高等学校; 大学课程改革; 阻力; 利益相关者理论; 人才培养; 教育改革

**中图分类号:** G423.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8750(2011)03-0097-06 **收稿日期:** 2011-03-28

**作者简介:** 刘付林(1982—), 男, 江苏扬州人, 南京审计学院校长办公室助理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课程社会学。

## 一、引言

美国管理心理学家勒温认为:“在任何一项变革中, 都存在着推力与阻力这两种对抗力量, 前者可以发动并维持变革, 后者则阻止变革发生或进行。”<sup>[1]</sup> 大学课程改革亦是如此, 推力和阻力左右着大学课程改革的成败。

大学自诞生以来始终伴随着课程改革, 大学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大学课程改革史。大学课程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的教育改革工程, 并不是每次大学课程改革都能实现预设的改革目标, 当代众多的大学课程改革都是以失败而告终, 实然的改革结果与应然的改革目标相差甚远。我们可以借用教育改革研究领域的权威迈克尔·富兰的观点对此加以解释:“教育变革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教育变革具有非线性, 不要期望改革会按照预想的路径展开, 教育变革还具有不可预测性。”<sup>[2]</sup> 大学课程改革之所以困难重重, 是与改革进程中遭遇的阻力密不可分的。

20世纪50年代以来, 阻力问题成为教育改革研究的焦点之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

育计划研究所”第一任所长库姆斯将教育改革的阻力区分为四类: 物质上的阻力, 体现在缺乏资源和设备上; 行政管理上的阻力, 体现在规章制度和议事程序上; 哲学上的阻力, 表现在对理想的目的或目标持不同的观点; 心理上的阻力, 表现在个人的感情、态度和信念上<sup>[3]</sup>。程培杰等则将教育改革中遇到的阻力分为文化阻力、社会阻力、组织阻力和心理阻力等<sup>[4]</sup>。波尔·达林归纳了教育改革中可能存在的四个方面的阻力: 价值阻力、权力阻力、改革的实际阻力和心理阻力<sup>[5]</sup>。学理上, 课程改革是教育的下位概念; 事实上, 课程改革是教育的核心内容。因此, 教育改革的阻力基本涵盖了课程改革的阻力, 研究课程改革的阻力可借鉴关于教育改革阻力的分析框架。但是, 正如上述关于教育改革阻力的分类, 已有的研究力求广泛性、系统性, 但深度挖掘却不够。本文试图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视角出发, 深入探讨大学课程改革的阻力及其化解。

## 二、研究的理论基础

基于对美国20世纪80年代不确定的商业环

境的反思,战略管理的利益相关者方法作为一种新的理论和模型被提出来。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任何一个组织的发展都离不开各种利益相关者的投入或参与,组织追求的应是利益相关者的整体利益,而不应仅仅是某个单一主体(如股东)的利益。组织的决策必须要考虑各种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并给予相应的报酬和补偿,组织的发展前景有赖于管理层对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的回应质量<sup>[6]</sup>。

本文之所以选择利益相关者的分析视角探讨大学课程改革的阻力及其化解,是基于以下两点考虑:一方面,利益相关者理论的研究旨趣直接指向现实的人和人的利益需求,而人是决定任何一项改革成功与否的决定性要素。大学课程改革亦是如此,它的成败与政府、教师、学生、学生家长、用人单位等各类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满足情况紧密相关。通过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分析,我们可以探究大学课程改革对不同利益相关者的不同意义,研究各类利益相关者对大学课程改革形成的阻力及其化解。另一方面,“作为一种非营利性组织,大学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股东,没有人能够获得大学的剩余利润,某个人或某一类人都不能对大学行使独立控制权。大学是一个典型的利益相关者组织”<sup>[7]</sup>。政府、教师、学生、学生家长、用人单位等都是大学的利益相关者。选择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分析视角符合大学的组织特性。

### 三、利益相关者之于大学课程改革的阻力

什么是“利益相关者”?1984年弗里曼(Freeman)出版了利益相关者管理理论的奠基之作《战略管理:利益相关者方法》。在书中,弗里曼给出的“利益相关者”的经典定义是“能够影响一个组织目标的实现,或者受到一个组织实现其目标过程影响的所有个体和群体”<sup>[8]</sup>。作为一个典型的利益相关者组织,大学在实现其推进课程改革、培养高素质人才的组织目标的过程中,受到各类组织或群体的影响,这些组织或群体构成了大学课程改革的利益相关者。本文选取了政府、教师、学生、用人单位等影响大学课程改革目标实现的四类典型利益相关者进行分析,探讨其对大学课程改革形成的阻力及其化解。

#### (一) 政府经费投入不足,管理体制不完善

大学的课程改革是紧紧围绕人才培养方案开

展的,人才培养方案制订和修订的主体均是大学自身,因此,大学课程改革的主体非大学莫属。然而,大学的课程改革不只是遵循高等教育规律和人才培养规律的教育行为,它也是在现实的制度环境与社会背景中权衡各种利益关系的社会行为。政府虽然不是大学课程的主要供给者,却是大学课程建设经费的主要提供者。包括课程建设与改革在内,大学的事业发展始终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即使是市场化程度很高的美国大学也不例外。无论在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中,政府与大学之间的关系一直是高等教育中的重要关系,政府是大学课程改革的重要利益相关者。

大学课程改革必须紧紧围绕政府实施的高等教育重大战略部署来开展,比如“211工程”、“985工程”、“质量工程”等。以“十一五”期间的“质量工程”为例,大学课程改革的核心评价指标体系就是国家级和省级的精品课程、教学名师、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精品教材等项目的立项与建设,因为这些项目的立项意味着政府会给相应的大学提供大量的财政拨款。有了经费支撑,课程改革的人力、物力等各种要素才会源源不断地得到补给,课程建设的水平才会不断达到新的高度。毫无疑问,政府是重要的课程改革与建设项目的方案设计者、管理者、评价者,通过经费这只看不见的手,政府实现了对大学课程改革的有效控制。然而,在国家的教育经费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较低的大背景下,政府对大学课程改革投入的经费是有限的,大学课程改革的经济基础是薄弱的,大学课程改革的动力是不足的,因此,政府经费投入不足是大学课程改革的重要阻力。

表面上,大学课程的管理者是大学自身,大学是课程改革的主体,享有课程改革的发言权、管理权、评价权等各类权利,实质上,政府才是大学课程改革的仲裁者。大学重要的课程改革均要得到政府的认可方能获得合法性并予以实施。大学课程改革始终在专业建设的框架内开展,通过牢牢掌控专业增设、调整等专业建设活动的审批权、决定权,政府实现了对大学课程改革的有效控制。大学课程系统中占统领地位的国家级、省级精品课程或特色课程的评选、立项、建设、管理等活动都是由政府控制,即使是体现学校特色的校级课程建设活动也是在政府有关课程文件的框架内开展的。可以说,大学课程改革的所有元素、所有环

节都在政府的直接管理或间接管理的范畴内。政府对大学课程的管理过于集中构成了大学课程改革的阻力。

## （二）教师主动参与不够，评价体系不合理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者也。”<sup>①</sup>大学教师是大学教育活动的实施者，是大学实现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功能的行为主体。课程改革的历史经验证明，教师对于课程改革的成功具有决定性意义，教师积极主动的参与是课程改革成功的保证。

正如加拿大著名课程专家大卫·杰弗里·史密斯指出的，很多课程改革“在制定其教育决策的时候，很少考虑教师的经验。教师只不过是些公仆，其职责是将别人作出的决定付诸行动”<sup>[9]</sup>。这种远离教师的课程改革，使得“教师的利益和意见在学校发展中没有得到充分的表达，教师的参与是一种被动参与”<sup>[10]</sup>。同样，大学教师参与课程改革往往是因为“被卷入”而被动参与，不是发自内心的主动参与。因为主动性和积极性不够，教师参与课程改革的热情和潜力难以被有效激发，课程改革的效果可想而知。同时，课程改革的推行，意味着新的课程体系和新的课程模式的出现，这就要求教师更新课程观念，提升课程开发、实施、评价等方面的综合能力，为此，教师要付出更多努力，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由于教育工作具有一定的重复性，教师容易陷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机械循环中。课程改革的创新性与教师教育活动的重复性之间的矛盾也影响到教师对课程改革的参与度。

近些年来，对大学教师的评价与考核呈现出过度量化和功利化的倾向，重科研、轻教学，重结果、轻过程，重指标、轻内涵的现象日益明显。一方面，在高等教育从外延扩张向内涵建设转变的新时期，众多大学的发展目标同质化为从“教学型”院校向“教学科研型”院校转变，或是从“教学科研型”院校向“科研教学型”院校转变，科研在大学中的重要地位日益突出。另一方面，科研工作量可以量化为论文、课题、科研经费等显性内容，因此对教师的科研考核更具操作性和可比性。相对而言，教学是塑造人的活动，教学效果在短期内不易显现，对教学工作的考核与评价较难被量化。因此，在当下的教师评价体系中，对科研重要性的强调无以复加，对教学的关注日趋减少；科研

投入的回报率高，教学投入的回报率低。面对这种不合理的评价体系，教师自然会把更多的精力投向科研，从而忽视教学活动中的课程改革。不合理的评价体系导致教师重科研、轻教学的行为偏向，形成大学课程改革的强大阻力。

## （三）学生认同度不高，主体地位被忽视

学生是大学存在的理由。就大学课程而言，学生理应是最核心的利益相关者。1998年召开的世界高等教育大会通过的《21世纪的高等教育：展望和行动世界宣言》就明确指出：“国家和高等院校的决策者应把学生及其需要作为关心的焦点，并应将他们视为高等教育改革的主要参与者和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要使“学生参与有关高等教育问题的讨论，参与评估，参与课程和教学法的改革，并在现行体制范围内参与制定政策和院校的管理工作”。

事实上，学生对于大学的重要性并没有在课程改革活动中得到应有的体现。大学课程改革往往远离学生，学生成了课程改革的局外者、旁观者和被动的接受者。大学课程改革从设计、实施、管理到评价的过程中，学生始终没有主体式的参与。即使是有限的参与，也只是表现为被迫做几份关于课程改革的问卷，接受几次相关的访谈。课程改革方案的合法性能够得到政府、大学管理者、大学教师的认可，但不一定能得到学生的认可。大学课程改革的立足点和落脚点往往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不是学生身心发展的需要。这样的课程改革往往脱离学生的现实生活，难以激发学生内在的价值需求，学生的认同度自然很低。因为认同度不高，学生对课程改革容易产生排斥心理，视课程改革为学校额外增加的负担，这种情况不利于课程改革的推进。

大学课程改革的消费者是学生，因此，学生最有权利评判课程质量，课程改革也应该以是否满足学生成长成才的需要为评价标准。虽然以学生为本、以学生为主体的课程理念得到了广泛传播，但实际情况与之相差甚远，学生主体地位被剥夺的现象比比皆是。众所周知，大学生处于特殊的身心发展阶段，对自主性、能动性、主体性具有强烈的追求和渴望。然而，在现实的大学课程改革的进程中，学科逻辑占据了上风，学生心理发展逻辑被严

<sup>①</sup>语出自韩愈《师说》。

重忽视,学生主体地位严重缺失。在此情形下,学生参与大学课程改革的行为常常是被迫和无奈的,必然对课程改革产生阻力。

(四) 用人单位眼光不够长远,功利性思维过强  
在精英教育时代,大学生是天之骄子,用人单位对大学毕业生极度渴求,对大学课程改革没有真正的发言权。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时代的到来,用人单位可招聘的人选明显增多,大学生就业的供求关系发生了显著变化,用人单位成了卖方市场,大学生成了买方市场。因为这样的供求关系,所以用人单位对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出更高的要求,由此对大学课程改革的影响力愈发增大。

很多用人单位在招聘大学生时经常会优先考虑有工作经验的应聘者,这也是很多应届大学生在求职过程中经常碰壁的主要原因。类似招聘条件的背后反映出用人单位的用人眼光不够长远,一味强调应聘者在短时间内的工作适应能力,忽视了应聘者长远的工作创新能力和未来发展潜力。在当下大学生就业形势极其严峻的现实背景下,用人单位的用人标准对大学课程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大学课程出现了一味褒实践课程、贬理论课程,重视应用能力、忽视发展潜力的不良现象。用人单位作为一种强大的外部力量,因为眼光不够长远对大学课程改革形成了阻力。

大学的重要办学目的是为社会培养各类高素质人才,人才素质的高低由用人单位来评价。作为大学的主要产出(大学毕业生)的使用者,用人单位对于大学人才培养质量的要求具有当然的合法性。然而,大多数用人单位选材用人的标准遵循市场化的思维方式,追求成本最小化、利益最大化,表现出很强的功利性。无论什么用人单位,他们对应聘者都会提出类似“上手要快”、“在指定的工作岗位上尽快胜任”等要求。在用人单位功利化的思维模式下,大学生被异化成了劳动工具,而不是完整的生命体。用人单位的这种用人导向对大学课程改革产生了巨大阻力。

#### 四、以整体利益化解大学课程改革的阻力

阻力不只是产生消极的影响,也可以带来积极的影响。正如莫瑞尔(Maurer)观察到的,阻力也是改革成功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往往是那些有反抗情绪的人会告诉我们一些重要的东西,

我们也会受到他们的影响。他们为那些被认为是好的东西据理力争,他们或许看到了我们不曾梦想过解决方法,他们或许看到了我们不曾看到的(改革)实施过程中的细节问题”<sup>[11]</sup>。认真分析阻力,挖掘其根源,通过积极的措施予以化解,改革可以取得更好的效果。

(一) 加大政府经费投入,推进课程管理重心下移

经费短缺一直是制约大学发展的重要因素,增加政府的经费投入是大学实现更好更快发展的有效途径。人才培养是大学的核心任务,课程是大学培养人才的核心载体,因此,课程改革对大学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大学的质量与特色某种程度上就是表现为一系列高质量、有特色的课程。课程改革离不开经费支持,经费是课程改革的先决条件。政府在不努力扩大高等教育投入的前提下,应该首先考虑加大课程改革经费的投入。当然,加大经费投入的同时,加强经费使用的绩效评估也是不可或缺的。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大学课程经费的投入、使用、评估等环节之间的良性循环,有效地缓解政府经费投入不足之于大学课程改革的阻力。

当代课程改革常常由政府启动和推进,“政府改革”成为改革的常态形式<sup>[12]</sup>,课程的管理权高度集中在政府。课程具有意识形态属性,但其根本属性还应该是教育性;课程改革可以是政府行为,但其本质属性还应该是教育专业行为。课程管理的高度集权不符合课程及课程改革的专业品质。为进一步激发大学实施课程改革的积极性、主动性,政府应该推进课程管理的重心下移,将课程改革的权力充分下放到大学,还大学课程改革的主体地位,这也符合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即政府与大学之间变成一种伙伴关系。正如《世界高等教育大会宣言》指出的那样,高等教育与国家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是高等教育变革与发展的先决条件。

(二) 促进教师主动参与,完善评价体系

“革新的成败最终取决于全体教师的态度。”<sup>[13]</sup>广大教师是课程改革的直接参与者,课程改革的合法性只有获得教师的认同,教师才会把课程改革中所体现出来的价值理念、方法、规范等内化于心,并在实际行动中予以推行。心理学研究表明,参与管理对变革活动有多方面的作用,它既可以吸取参与者的智慧,又可以增强其心理满

足感,减少思想阻力。因此,大学应广泛提高教师对课程改革的主动参与度,引导教师共同参与选择和拟定课程改革方案,共同分享信息资料,加强意见交流和信息沟通,对出现的问题尽量采取民主协商的方式解决,这将有助于缓解阻力,顺利推进课程改革。

“教师也是一个理性的人,他们总是从对其自身利益最大化方面来对课程改革政策进行分析。正是教师对于自身利益的诉求,才从根本上为课程改革提供动力;也正是由于教师自身利益在课程中得到了满足,才能从根本上认同课程改革,并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课程中去。”<sup>[14]</sup>事实上,远离教师的个人利益诉求来高谈课程改革,是一种对教师片面化认识的表现。改革的发起者与受众对改革的价值需求不一致,会导致改革的目标与手段的价值错位或倒置,最终使改革异化。因此,大学管理者应着力改变当下不合理的教师评价体系,强化教学立校的办学方略,突出教学的中心地位,加强对教学工作的评价,引导教师主动为教学投入更多的精力,为课程改革付出更多的努力。

### (三) 提高学生认同度,突出主体地位

学生之所以对大学课程改革的认同度低,其重要原因就是课程改革远离他们的现实生活经验,因此,课程改革者应创造条件,让学生充分参与到课程改革的全过程,拉近学生与课程改革的距离。课程改革方案的制定要充分吸纳学生有价值的建议,课程方案的实施要充分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大学应通过广泛宣传、加强沟通等多种途径,让学生深入理解课程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提高他们对课程改革合法性的认识以及认同度。认同度一旦提高,课程改革和学生之间就会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而不是对立关系。在高认同度的前提下,学生学习新课程的动力往往是兴趣使然,而非不得已而为之。

课程的服务对象是学生,学生是课程改革的多极主体之一。长期以来,课程哲学视野中的学生是被改造的对象,处于被动的客体地位。大学课程的理念也烙有这样的印迹,即使是身心发展已经相对成熟的大学生也毫无主体地位可言。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就是尊重学生对课程改革的话语权,将学生的意志渗透进课程,使学生的评价成为衡量课程改革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尺之一。课

程改革的根本宗旨是促进学生更好的发展,个体的发展仅仅靠外力很难推动,只有充分激发主体性,学生才会全身心的吸纳课程,将外在的课程要求转化为内在的发展愿望。

### (四) 加强与用人单位沟通交流,完善课程结构

很久以来,作为远离社会的象牙塔,大学很少与用人单位沟通。大学的教育逻辑与用人单位的用人逻辑缺少交集,大学培养出来的人用人单位不要,用人单位想要的人大学培养不出来。课程改革亦是如此。大学开展课程改革不能只是局限于大学内部,还应该让用人单位参与其中,与用人单位就学生的素质结构、培养模式等展开交流,彼此沟通,交换意见,增进理解。当然,大学应以批判性的眼光扬弃用人单位的观点,择其正确的意见指导课程改革,就其不妥的看法与之沟通商榷。通过交流与沟通,在大学和用人单位之间架起桥梁,使人才的进口和出口之间实现良好的对接。

在学生各种素质结构中,就业的核心竞争力还是体现为实践能力和工作的适应能力,因此,为了帮助学生在用人单位站稳脚跟,适当增加实践类课程,提高其质量,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是必要的。当然,大学课程改革的指导原则不能只是用人单位的实用原则,还要紧扣学生创造性思维、批判性思维等综合素质的培养,立足学生作为一个完整的生命体的发展,因此,在大学课程菜单中,理论型课程也是不可或缺的。大学课程改革要合理调整实践类课程与理论型课程的结构,构建科学合理的课程生态系统。

### 参考文献:

- [1] 宋海兵. 试论教育组织变革的阻力及其控制策略[J]. 高等教育研究, 1992(4): 42-45.
- [2] 富兰 M. 变革的力量——深刻变革[M].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 加拿大多伦多国际学院, 译.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4: 25.
- [3] 库姆斯 A W. 教育改革的新假设[M]// 瞿葆奎. 国际教育展望.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3: 278.
- [4] 程培杰, 马健生. 试论教育改革阻力的来源[J]. 比较教育研究, 2001(6): 49-53.
- [5] 达林 B. 教育改革的限度[M]. 刘承辉, 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91: 32.
- [6] 柏檀, 周德群. 高等教育质量的利益相关者动态分析[J]. 黑龙江高教研究, 2009(10): 7-9.